

沈从文晋升教授风波



沈从文

沈从文到西南联大任教,是西南联大常务委员、《大一国文》主编杨振声举荐的,目的是为了扩大新文学的影响,当然也有友情的因素。在此之前,沈从文先后在中国公学、武汉大学任教,1931年,沈从文到青岛大学任教,当时校长是杨振声。

1939年6月6日,杨振声和朱自清参加西南联大师范学院教师节聚餐会和游艺会,杨向朱提议聘请沈从文到联大教书,朱自清感觉“甚困难”。6月12日,朱自清拜访罗常培,商量聘请沈从文到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国文系任教一事,结果

甚满意。

1939年6月27日,联大常委会召开第111次会议,有一项内容是决定聘沈从文为联大师范学院国文系副教授,编制在师范学院的国文系。

沈从文进入联大,不如那些留学海外、拿了硕士或博士文凭的“海龟”那样顺利。沈从文入西南联大任教有较大阻力,当时的校委会和中文系似乎并不认可这位作家来当教授。《杨振声编年事辑初稿》一书中,记录了一个小故事,可以看到当时沈从文进联大执教的阻力:一年暑假,在联大就读的杨振

声之子杨起到昆明东南部的阳宗海游泳,休息时,到一个茶馆喝茶,桌上的查良铮(即诗人穆旦)说:“沈从文这样的人到联大来教书,就是杨振声这样没有眼光的人引荐的。”在当时,查良铮的观点代表了不少人的看法。

1943年7月,沈从文晋升为教授,校常务会议决定“改聘沈从文先生为本大学师范学院国文系教授,月薪三百六十元”。这个薪水看似不错,但据余斌在《西南联大·昆明记忆》记载,晚沈从文两个月晋升教授的周覃被因为是英国爱丁堡大学商学士,虽比沈从文小8岁,1942年才担任讲师的,月薪是430元。沈从文所领薪金为教授一档的最低起薪。

以新文学为业的沈从文,尽管小说名满天下,在西南联大并不为人重视,有人写小说影射他;甚至有人瞧不起他,并公开宣布。

写小说影射沈从文的是钱钟书。美国学者金介甫为写《沈从文传》采访过钱钟书,钱说,沈从文这个人有些自卑感。钱钟书的中篇小说《猫》影射文化艺术圈的好多名流,小说中的作家曹世昌,据说原型就是沈从文。“他在本乡落草做过土匪,后来又吃粮当兵,其作品给读者野蛮的印象;他现在名满天下,总忘不掉小时候没好好进过学校,还觉得那些‘正途出身’者不甚瞧得起自己”。

公开瞧不起沈从文的是刘文典,据说在讨论沈从文晋升教授职

称的会议上,他勃然大怒,说:“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朱自清该拿四块钱。可我不给沈从文四毛钱!”还有一种版本,“沈从文是我的学生,他都要做教授,我岂不成了太上教授?”刘文典一向狂狷,他说这样的话,并不意外。当时联大的一些教授以国学为学术生命,对新文学和作家,并不接受。当然,刘文典不仅看不起沈从文,也瞧不起其他用白话文写作的作家。

刘文典最瞧不起沈从文的证据,当属跑警报时的一段掌故。有一次跑警报,沈从文碰巧从刘文典身边擦肩而过。刘面露不悦之色,说:“我跑是为了保存国粹,学生跑是为了保留下一代的希望,你干嘛跑啊?”

事实上,联大的教授待沈从文不错,不少教授和他成为朋友。比如,与刘文典关系不错的吴宓没有这么偏激,从金介甫的《沈从文传》和《吴宓日记》中可以得知,吴宓和沈从文在昆明结下友情,两人颇谈得来。

当沈从文晋职时,这个闻名遐迩的小说家被许多人贬为学术上的无名之徒,吴宓却挺身而出,为他辩护:“以不懂西方语言之沈氏,其白话文竟能具西方情调,实属难能。”别忘了,吴宓在白话文兴起的运动中,是竭力反对者。吴宓能为以白话文写小说的沈从文说这么一番话,真是难得。

(摘自《青年参考》)



吴晗和夫人袁震 1939年在昆明的结婚照

吴晗偏科 数学考零分

在位于金华的浙江省立第七中学念书时,吴晗经常旷课,还学会了吸烟、打麻将。若不是因为他的国文、历史两科成绩优异,他早就被开除了。1927年中学毕业后,吴晗想继续求学,但父亲出于经济原因,只希望儿子能拥有一个小学教师的饭碗。父子之间大吵一架,吴晗随即离家出走。那晚大雨滂沱,家人以为他掉入池塘淹死了,打捞了一晚上。

几天后,父亲收到儿子的信,吴晗说自己打算到天台山当和尚,那里有学问渊博的师父。因为同学的接济,吴晗最终没有出家,而是考上了杭州的之江大学。一年后,之江大学停办。吴晗揣着剩下的资费来到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部,在那里遇到了时任中国公学校长的胡适。

1930年3月,21岁的吴晗第一次给胡适写信,说自己打算认真读《佛国记》、《大唐西域记》等佛学典籍,请胡适给予指点。

此后不久,胡适辞职,回到北平。于是,吴晗决定转学到燕京大学。然而,以他在中国公学的“丙等”英文成绩,根本不可能被教会办的燕京大学接收。

还好,他去北平前,请中国公学的另一位教授写了推荐信,得以见到异常爱才、时在燕京大学执教的顾颉刚。在顾先生的安排下,吴晗在燕大图书馆找到了一份差事。

顾颉刚在一篇文章中提及明朝著名学者胡应麟的生年当在60岁以上,而吴晗在燕大图书馆看到的史料则说,胡应麟死于1602年,享年52岁。这个在今天看来或许并不重要的问题,恰恰是胡适、顾颉刚等权威学人的兴趣所在。吴晗似乎意识到机会来了,他搜集有关胡应麟的资料,写成了一本《胡应麟年谱》。

书稿完成后,吴晗即刻呈送胡适,希望胡适能“费一点功夫,多多指教”。

这本年谱真是深得胡适的喜爱!胡适此前曾“大胆假设”胡应麟死时约50岁,可惜并无时间去搜查证据,现在吴晗不仅“帮”他验证了假设,而且初步理清了胡应麟一生的行踪。收到书稿的第二天,他便欣然提笔致信吴晗。

吴晗终于赢得了胡适的器重,得以拜入胡适门下。

1931年初,吴晗决定辞去燕大图书馆的工作,投考胡适主持的北大文学院。结果,他的文史与英文皆考了满分,但数学却是零分。北大的规定是,只要有一门零分便不能录取,胡适也不愿坏了这个规矩。

吴晗只得转考清华大学,成绩仍是文史、英文皆一百分,数学零分。不过,清华破格录取了他。

胡适去信清华校长翁文灏,请后者大力培养吴晗,并安排勤工助学岗位,解决他的经济问题。

在胡适等人的提携下,吴晗逐渐成为备受学界瞩目的学术新星。

正因为有胡适等人的关照,吴晗丝毫不担心毕业后的去向问题。1934年,吴晗毕业前,傅斯年主持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就有意聘请吴晗。不过,最后还是清华史学系得到了吴晗,让其担任助教,主讲其擅长的明史研究,月薪100元,比一般的助教高出40元。不久,吴晗又升为讲师。

(摘自《周末》)

交谊舞解禁前后

1979年除夕夜,消失多年的交谊舞第一次出现在人民大会堂的联欢会上。舞会上,一对青年男女优美地跳着华尔兹,女子与男伴距离保持在20厘米开外。他们脸上荡漾着幸福的笑容。女的叫盖小玲,是著名演员,后来改名叫盖克。

当时参加舞会的人很多,由国务院管理局组织,一些领导干部和一些文艺团体的青年参加。在此之前,跳交谊舞是不被允许的,那次大会堂舞会是一个信号。

大会堂里舞禁初开,民间一些时髦的年轻人已嗅到了肢体解放的味道,迪斯科悄然流行。

民间舞会潜行了有一年多,

到了1980年6月,公安部和文化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取缔营业性舞会和公共场所自发舞会的通知》。一时间,交谊舞处境不妙,穿着时髦几乎成了流氓的代名词,跳交谊舞被指第三者插足。

1986年,王蒙复出,当上了文化部长,上任之初就干了一件大事:让交谊舞解禁。

当时,文化部、国家工商管理局和公安部鉴于各地冒头的歌舞厅现象,还曾联合发文,严令不准开设营业性的歌舞厅。但有个省的人大常委会有过一个不执行三个部门联合文件的决议,中央部委文件遭遇地方“搁车”。

人们需要丰富的业余文化生活,问题不是应不应该开歌舞厅,而是如何管理好的问题。作为文化部长,王蒙一上任就给交谊舞解禁定了调子。

交谊舞开始从小众的圈子向大众蔓延,几乎刮的是一场旋风,一夜之间,各单位的工会都开始发动组织舞会。

1987年2月,文化部、公安部、国家工商联合下发《关于改进舞会管理问题的通知》,第一次明确肯定了“举办营业性舞会是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一种客观需求”。

(摘自《老年生活报》)

林肯曾计划把黑人赶出美国

亚伯拉罕·林肯签署了《解放奴隶宣言》,把黑人从残酷的奴隶制中解救出来。但鲜为人知的是,林肯曾致力于将黑人移出美国。

“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把黑人送回非洲老家”,是当时美国人想解决黑人问题的主流思想。1861年3月,林肯就任总统,正式将迁移黑人计划付诸实施。在当年的总统年度咨文中,他向国会提出迁移自由黑人的建议并得到响应,国会拨款10万美元,后来增加到60万美元。

把黑人送回非洲并不那么容易。毕竟非洲太遥远,耗资太大。尽管有国会支持,但纳税的白人不肯为黑人买单。据林肯估计整个迁移需要37年才能完成,巨额费用需要几代人来承担。

于是,林肯又把目光投向附近的中美洲地区。为配合林肯的这一计划,寻找合适的殖民地

点,国会开始了一系列外交斡旋活动,但计划真正得以实施的只有海地的一个小岛。政府曾与一个叫本纳德·科克的人签订协议,科克同意以每人50美元的价格迁移5000黑人到小岛上。但这一计划几经周折仍未成功,政府不得不于1864年接回岛上的黑人。

但是,形势并未如林肯所愿,南方奴隶主根本不接受林肯的有偿释放奴隶的方案。所以,林肯一厢情愿的迁移计划也无从实施了。

既然南方不肯接受有偿释放奴隶的停战方案,为扭转战局,软的不行,林肯就来硬的,他于1862年9月22日发布了《解放奴隶宣言》,宣布从1863年1月1日起,所有叛乱各州的奴隶应被看作是自由人,可以应召参加联邦军队。

《宣言》给了黑人最终会赢

得美国公民身份和联邦宪法所赋予的所有权利的希望,其影响立竿见影,南方各州的黑人奴隶纷纷逃到北方参加联邦军。

(摘自《老年生活报》)



亚伯拉罕·林肯



傅作义

傅作义所属部队 为何被称“七路半”

“七路半”,是国民党军中对华北傅作义部队的一种独特称呼,意思是虽然傅作义不是八路,也就差那么一点了。

“七路半”这个称呼,原因众说不一。有讲这个说法最初来自日伪,因为傅作义的军队作战比较积极,一些战术类似“土八路”,这一点给日军的情报系统造成了混乱。日本保存着一份华北地区共产党军队的序列资料,日军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把傅作义部下的35军和新编第32师统统“划给”了共产党。

傅作义在抗战期间比较亲共,可能也是原因之一。1938年,他曾经大量接受共产党员入其部队工作借鉴其作战方法。当时傅部只有两个师,两个师的政治部主任阎又文、康保安竟然都是共产党员。

此外还有一个原因大概是因为傅军从上到下作风简朴,傅作义本人布衣粗食,在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中比较罕见。在正统的国民党官员眼里看来,这就有点儿像共产党“土八路”了。杜聿明曾经在国防部高参郭汝瑰家看到一个有洞的沙发,于是猜测郭汝瑰是共产党,原因是国民党里面没有这么朴素的高官。这样一来,傅作义所属部队被叫做“七路半”倒也有一定道理。
(摘自《新华网》)